

#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何以驱动企业突破性创新?

徐保昌 丁忠贤 李思慧

**摘要:**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旨在破除地方保护与要素流通梗阻,为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实现提供制度支撑,助力企业核心竞争力跃迁。本文采用2010—2022年地级及以上城市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促进企业突破性创新,而市场需求规模扩大、竞争环境优化和分工程度深化是其中的主要机制。此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突破性创新驱动效果在大规模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 and 位于创新试点城市的企业中尤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充分释放全国统一大市场制度红利、推进企业突破性创新“破圈”提供了经验支持。

**关键词:**全国统一大市场 突破性创新 要素配置 市场需求规模 竞争环境 分工程度

**中图分类号:**F123.9;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26)03-0066-19

## 一、问题提出

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科技创新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而突破性创新则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sup>[1-2]</sup>。《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工信部联科[2024]12号)强调,要“以前沿技术突破引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突破性创新是对现有技术路径的根本性颠覆,而非渐进式改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外技术封锁的双重压力下,尽管中国在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和前沿突破性技术攻坚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仍面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尚未完全突破、创新激励机制亟待优化等诸多挑战,造成这一现象的本质原因在于传统创新范式与碎片化市场结构的深层矛盾<sup>[3]</sup>。要破解这一困局,亟须通过制度创新破除地方行政壁垒,重构创新要素的底层配置逻辑。

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中国在经济发展新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收稿日期:2025-09-02;修回日期:2026-01-30

基金项目: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十五五’期间市场整合与人工智能双轮驱动下的亲清政商环境构建研究”(ZK0120250143);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国内市场整合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tsqn202306167)

作者简介:徐保昌 青岛大学经济学院/山东省世界经济研究基地副教授,通信作者,青岛,266061;

丁忠贤 青岛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李思慧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南京,210004。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的评审意见。

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首次提出“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强调“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2022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为突破口,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明了方向。同时,这也为破解区域市场“碎片化”导致的突破性创新困境提供新思路:通过制度规则统一消解政策摩擦成本<sup>[4]</sup>,借助要素流通重构创新资源配置函数<sup>[5]</sup>,依托市场监管协同降低技术扩散风险<sup>[6]</sup>。2024年12月《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正式发布,“五统一”架构与“一破除”机制的系统性耦合,标志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从破除显性壁垒向打通制度性堵点的纵深推进,强化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可行性。这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打破行政壁垒、贯通创新链条,进而推动企业突破性创新提供了解决方案。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持续推进,有助于打破传统市场边界,促进要素自由流通;同时,公平竞争、规则统一的营商环境可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由此可见,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已成为进一步推动企业实现突破性创新、助力科技高水平发展的新动能。在此背景下,探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如何破解企业突破性创新困境,进而构建科技自立自强的微观驱动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否推动企业实现突破性创新?其主要实现机制是什么?这对理解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政策效能、优化制度设计、加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决策参考价值。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打破市场准入壁垒,重塑公平竞争秩序,为推动企业实现突破性创新提供了基础条件。然而,现有研究尚未建立具体影响机制的理论框架,且缺乏更为直接的逻辑关系分析。鉴于此,本文将201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层面数据与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数据进行匹配,实证考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三个方面。第一,本文针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如何影响微观主体突破性创新行为这一核心问题,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企业突破性创新直接关联,系统考察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破除市场分割、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如何刺激企业创新动力的内在逻辑。现有研究多聚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资源流动与配置效率<sup>[7]</sup>、经济增长<sup>[8-9]</sup>、消费者福利增进效应<sup>[10]</sup>等方面的影响,而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等技术创新与知识创造层面的研究较少,本文则对技术创新领域的研究进行了有益补充。第二,本文分别从市场需求规模扩大、竞争环境优化和分工程度深化等视角出发,系统揭示了宏观制度通过激发创新动力、施加创新压力和提升创新能力的协同路径,作用于企业微观创新行为的过程。这不仅拓展了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在转型经济情境下的解释边界与适用性,也为“制度环境-企业行为”的经典理论框架提供了来自新兴市场国家制度实践的新见解。第三,本文通过剖析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突破性创新效应,不仅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微观证据支持,也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激发微观主体突破性创新活力提供了可操作的政策路径。

## 二、文献综述

### (一)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经济效应研究

首先,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双向优化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一方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打破区域间的行政壁垒与市场分割,使企业能够更加便捷地获取技术等创新资源<sup>[11]</sup>;另一方面,它可以加速省内城市间资本要素分布均等化,提升资本的空间配置效率<sup>[7]</sup>。随着资源配置优化效应进一步延伸至消费领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促进最终品跨区贸易、中间品跨区生产等路径提升了国内消费者福利水平<sup>[10]</sup>。其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地方产业政策并非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存在互补效应,二者均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和总福利增加<sup>[12]</sup>。最后,随着研究视角向国际维度延伸,众多学者关注了统一

大市场建设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的战略价值。钱学锋和周文倩指出,畅通国内大循环可以降低“友岸外包”引起的福利损失,且国内循环中要素市场一体化发挥的作用要大于商品市场一体化<sup>[13]</sup>。

## (二) 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

首先,制度环境维度。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可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企业突破性创新<sup>[14]</sup>,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制度型开放可以有效推动企业技术创新量质齐升<sup>[15]</sup>。选择性产业政策只对企业策略性创新起积极作用<sup>[16]</sup>。其次,技术赋能维度。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企业突破性创新具有促进作用<sup>[8]</sup>。具体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长期可通过技术融合与知识重组等方式催生突破性创新<sup>[17]</sup>。此外,金融科技可依托融资优化、知识积累、数字转型的三元驱动机制提升企业突破性创新<sup>[11]</sup>。最后,资源整合维度。知识重组有利于优化企业突破性创新路径<sup>[18]</sup>。同时,科技信息资源利用强度和不平衡性对企业突破性创新也存在积极影响,数据要素的突破性创新驱动作用在研发投资传导路径中尤为突出<sup>[19]</sup>。

既有研究围绕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经济效应与企业突破性创新的驱动机制展开了系统性探索,为本文奠定了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两方面不足。一方面,研究视角的局限性。现有文献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创新驱动效应多聚焦企业技术创新的总量提升,对创新质量跃迁的分析不够深入。突破性创新作为颠覆性技术变革的核心载体,其独特的高风险、高不确定性和非线性演进特征要求更适配的制度环境与资源整合逻辑,而现有研究尚未揭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如何通过制度协同与市场生态重构为企业突破性创新提供结构性支持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作用机制的黑箱化。既有文献虽已初步验证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但对作用路径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探索。例如,资源配置优化效应多停留于资本等传统要素,而数据、知识等高阶要素的跨域整合对突破性创新的作用尚未被充分解构。基于此,本文系统考察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并基于市场需求规模扩大、竞争环境优化与分工程度深化等视角剖析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驱动机制,以期更加深入地厘清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激励企业突破性创新的路径。

##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sup>[10]</sup>,其核心价值在于重构企业的外部环境,激发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内生动力。当前,企业突破性创新面临市场分割、数据壁垒、核心技术依赖、创新动力不足等多重难题,本质上源于要素流通的阻滞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桎梏。在这一背景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统一市场准入规则有望使企业摆脱跨区域经营的制度性约束。制度性交易成本的降低可以促进企业资源从“政策适配”转向“技术研发”,为企业突破性创新奠定基础性要素支撑。

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进一步延伸至技术与数据市场领域,有利于促进二者的深度融合。随着技术和数据市场一体化的进程加快,传统创新的地理边界与技术路径逐渐消解。数据共享与技术协同的加速催生出更具颠覆性的创新模式,这种创新生态的扩展使得企业能够突破既有技术框架限制,探索更高阶的突破性创新方向。在此基础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加强市场竞争性,而竞争格局的演变进一步为突破性创新注入持续动力。基于熊彼特理论,超大规模市场有利于发挥需求引致创新效应。当市场边界扩大、竞争强度加剧时,企业为维持竞争优势,更有可能加快技术迭代。随着这种竞争压力传导至研发端,企业会从渐进式创新转向更具战略意义的突破性创新。同时,核心技术自主化的迫切性也在市场信号的强化下不断凸显,进一步推动企业进行突破性创新。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1: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促进企业突破性创新。

具体而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主要通过市场需求规模扩大、竞争环境优化和分工程度深化来推动企业突破性创新。

### (一) 市场需求规模扩大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制度变革塑造和扩大有效需求规模<sup>[9]</sup>,提升企业对突破性创新的预期收益,从而激励企业将资源投入长周期、高成本的突破性研发活动中,改变企业创新决策,驱动企业突破性创新。熊彼特创新理论强调,企业家从事创新活动的根本动机是对潜在垄断利润的追逐。这种动机依赖于创新成功的预期回报。在市场分割状态下,企业受地区壁垒限制,预期回报的上限较低,难以覆盖突破性创新所固有的高投入、高风险,进一步降低了企业进行突破性创新的积极性<sup>[20]</sup>。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破除地区间制度壁垒、降低交易成本,将“碎片化”地方市场整合为统一超大规模市场,这极大地拓展了企业的潜在市场容量。根据沉没成本效应与规模报酬递增原理,对于前期研发投入巨大的突破性创新而言,庞大的市场规模意味着高昂的固定研发成本可以因销量的增加而被摊薄,进而可能提高企业进行突破性创新的边际收益与财务可行性,使企业有更强的动机将资源向那些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的突破性研发项目倾斜。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2: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扩大市场需求规模,促进企业突破性创新。

### (二) 竞争环境优化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打破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推动企业由模仿或寻租转向通过突破性创新构建核心竞争力。在存在地方保护的市场环境中,竞争机制是扭曲的,企业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时有发生,而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可能更依赖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等非市场能力<sup>[21]</sup>,而非其创新效率。这种“制度套利”空间削弱了企业通过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内在紧迫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强调统一市场监管规则与强化反垄断执法,旨在营造一个公平、透明、高效的竞争环境<sup>[22]</sup>,这意味着竞争模式的转变与竞争强度的提升。具体而言,企业间的竞争由关系竞争转为创新竞争,由地方竞争转为全国范围内竞争。公平竞争的不断加强对企业形成“倒逼”压力,迫使企业将创新作为生存与发展的核心战略,通过开展能够创造新市场或重塑现有市场的突破性创新来“逃离”原有的竞争红海,构建难以模仿的竞争优势,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与垄断利润。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3: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优化市场竞争环境,促进企业突破性创新。

### (三) 分工程度深化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促进地区产业多样化集聚、深化产业间分工,推动产业间的知识和技术交流<sup>[23]</sup>,进而驱动企业进行突破性创新。斯密-杨格定理指出,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市场规模越大,分工越细化,生产效率越高。在市场分割背景下,市场规模被人为地限制,导致产业链短、分工浅,而企业“小而全”的经营模式导致资源分散,难以在特定技术领域实现深度突破。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助于扩大市场范围,为分工程度深化创造了条件。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制度下,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促进了地区产业多样化<sup>[24]</sup>,这本质上是社会分工深化在宏观地域经济结构上的体现。多样化的产业生态创造了知识交叉融合效应,使不同产业的知识、技术实现交叉、融合与碰撞,提升企业基于知识重组的创新能力,从而催生新的技术范式。此外,产业间的分工程度深化可以降低试错成本,使企业从多样化的本地产业中获取互补性技术与服务,降低企业突破性创新的门槛与风险,进一步驱动企业突破性创新。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4: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通过深化分工程度,促进企业突破性创新。

## 四、实证设计

### (一)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主要使用以下两套数据:第一套为2010—2022年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CSMAR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中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包括上市企业的基本信息、财务数据和研发创新数据;第二套为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城市的统计年鉴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本文按照城市的行政区划代码将两套数据进行匹配。为确保数据质量,本文借鉴李玉花等<sup>[17]</sup>、徐保昌等<sup>[25]</sup>的做法,对数据进行如下清洗:剔除当年企业处于其他特别处理(ST)、退市风险警示(\*ST)状态的样本;剔除金融行业的企业;剔除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前后1%的缩尾处理;对部分少量缺失的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自动剔除单例观测值;由于原莱芜市在2019年合并到济南市,2019年及以后的莱芜市样本数据由济南市替代。

### (二) 模型设定

为检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与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关系,本文参考李玉花等<sup>[17]</sup>的研究,设定基准回归模型为:

$$\ln INNOV_{k,i,t} = \alpha_1 + \rho_1 MINTEG_{k,t} + X'_{k,i,t} \beta_1 + \gamma_i + \delta_k + \theta_t + \varepsilon_{i,k,t} \quad (1)$$

其中,  $\ln INNOV_{k,i,t}$  代表位于城市  $k$  的企业  $i$  在第  $t$  年的突破性创新,  $MINTEG_{k,t}$  代表城市  $k$  在第  $t$  年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X'_{k,i,t}$  是企业 and 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向量;  $\alpha_1$ 、 $\rho_1$ 、 $\beta_1$  分别为常数项、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和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向量;  $\gamma_i$ 、 $\delta_k$ 、 $\theta_t$  分别是企业固定效应、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k,t}$  为随机扰动项。同时,参考张陈宇等<sup>[26]</sup>、陈林等<sup>[27]</sup>的研究,将标准误聚类到企业层面。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市场需求规模扩大、竞争环境优化和分工程度深化可能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影响企业突破性创新的主要机制。参考董晓和于明哲(Dong & Yu)<sup>[28]</sup>的研究,本文对假设2—假设4进行检验。设定如下模型进行机制检验:

$$M_{k,t} = \alpha_2 + \rho_2 MINTEG_{k,t} + X'_{k,i,t} \beta_2 + \gamma_i + \delta_k + \theta_t + \varepsilon_{i,k,t} \quad (2)$$

其中,  $M$  分别表示机制变量市场需求规模( $\ln MD$ )、竞争环境( $MKTE$ )和分工程度( $KSI$ ),其余变量含义与模型(1)一致。

### (三) 变量说明

#### 1. 被解释变量:企业突破性创新( $\ln INNOV$ )

发明专利是所有专利中相对难度最大、技术含量最高的专利,且最终被授权的发明专利意味着其通过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审查,具有创造性、实用性和高价值。为突出企业的突破性创新能力,本文参考刘政等<sup>[15]</sup>、黎文靖和郑曼妮<sup>[16]</sup>、张陈宇等<sup>[26]</sup>、吴超鹏和严泽浩<sup>[29]</sup>的做法,采用企业当年独立获得的发明专利数量加1后取自然对数来测度企业突破性创新。

#### 2. 核心解释变量:全国统一大市场( $MINTEG$ )

现有文献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测度多采用相对价格法。本文借鉴徐保昌等<sup>[30]</sup>的研究,基于城市层面数据,采用相对价格法构建市场整合指数对全国统一大市场进行测度。在指标选取方面,本文采用7大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测算。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首先,基于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环比价格,采用价格指数  $P$  取自然对数后进行一阶差分,测算相对

价格:

$$\Delta Q_{k,j,t}^u = \ln \frac{P_{k,t}^u}{P_{j,t}^u} - \ln \frac{P_{k,t-1}^u}{P_{j,t-1}^u} = \ln \frac{P_{k,t}^u}{P_{k,t-1}^u} - \ln \frac{P_{j,t}^u}{P_{j,t-1}^u} \quad (3)$$

其中,  $u$  为商品种类,  $k, j$  为城市对。

其次,对商品价格进行去均值化处理,得到实际相对价格变动,以去除商品异质性:

$$q_{k,j,t}^u = |\Delta Q_{k,j,t}^u| - \overline{|\Delta Q_t^u|} \quad (4)$$

最后,计算相对价格波动的方差  $Var(q_{k,t}^u)$ , 得到市场分割指数,并参考毛其淋和盛斌<sup>[31]</sup>的研究,计算城市  $k$  的市场整合指数:

$$MINTEG_{k,t} = \sqrt{\frac{1}{Var(q_{k,t}^u)}} \quad (5)$$

### 3. 机制变量

市场需求规模 ( $\ln MD$ ): 本文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单位:千亿元)取自然对数来衡量市场需求规模。该指标数值越大,市场需求规模越大。

竞争环境 ( $MKTE$ ): 本文参考牛志伟等<sup>[32]</sup>的研究,参照赫芬达尔指数(HHI),采用沪深A股上市企业营业收入测算该市的公平竞争程度,以表征该市的竞争环境优化水平。具体测算方法为:首先,计算每个企业营业收入占当年全市企业总营业收入比例的平方;其次,将该年度、同一城市内所有企业的平方比加总,得到城市-年度层面的赫芬达尔指数。该指标数值越小,市场集中度越低,公平竞争程度越高,竞争环境优化越好。

分工程度 ( $KSI$ ): 本文采用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作为地区分工程度深化的代理变量,该指标数值越大,地区产业越集中;反之,则地区产业较为多样,产业链内部分工深化,经济结构更为平衡。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首先,计算城市产业份额。分别计算城市  $k$  在第  $t$  年各产业(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占该城市全部产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记为  $Share_{k,n,t}$ , 其中  $n$  表示产业类别。

其次,确定参照城市并计算其产业份额。为缓解自身参照可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以除城市  $k$  之外全国其他城市整体作为参照城市。计算该参照城市中各产业在全国相应产业总量中的份额,记为  $Other\_Share_{n,t}$ 。

再次,计算城市与参照城市在各产业上的份额绝对差。对每一产业  $n$ , 计算城市  $k$  的产业份额与参照经济体产业份额之差的绝对值:

$$diff_n = |Share_{k,n,t} - Other\_Share_{n,t}| \quad (6)$$

最后,测算分工程度。将全部产业的份额绝对差加总,得到城市  $k$  在第  $t$  年的克鲁格曼专业化指数:

$$KSI_{k,t} = \sum_{n=1}^N |Share_{k,n,t} - Other\_Share_{n,t}| \quad (7)$$

### 4. 控制变量

参考詹新宇和梁蓝心<sup>[2]</sup>的研究,本文控制了企业和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1)固定资产比例 ( $FAR$ ), 以固定资产与总资产的比值表示。固定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反映了企业的资产结构特征。与轻资产型企业相比,重资产型企业可能面临更高的沉没成本与创新转型刚性,调整资源投入方向难度较大,控制该变量可排除资产专用性对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潜在影响。(2)企业管理费用 ( $OHD$ ), 采用企业管理费用(单位:千万元)衡量。该变量可以表征企业的组织复杂性和管理效率,如高管理费用可以反映冗余的科层结构或低

效的治理机制,可能挤占研发投入。(3)流动比率( $CR$ ),以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值表示。该变量可以反映企业短期偿债能力与财务稳健性,如高流动性可能增强企业风险承担意愿,但也可能预示资金利用效率低下,控制该变量可分离财务柔性对创新决策的独立影响。(4)资产收益率( $ROA$ ),以净利润与资产期末余额的比值表示。企业的盈利能力可以直接影响企业内部融资能力,如高资产收益率的企业可以通过利润留存进行更多的创新投入,但也可能产生创新惰性,因此需要控制其对企业资源禀赋与创新动机的双重作用。(5)教育支出( $EDU$ ),采用教育支出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的比值衡量。地方教育投入强度可以反映人力资本储备水平,高等教育机构密度与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影响企业技术人才获取成本,因此需要控制其对区域创新生态的长期塑造作用。(6)劳动成本( $\ln WAGE$ ),以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单位:千亿元)的自然对数表示。高劳动成本可能倒逼企业进行自动化创新,但也可能压缩研发预算,因此需要控制其对企业创新策略选择的影响效应。(7)经济发展水平( $\ln GDP$ ),采用地区生产总值(单位:千亿元)的自然对数表示。区域经济总量表征市场容量与需求复杂度,发达地区往往具备更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与风险投资体系,因此需要控制其对创新制度环境的整体性影响。(8)科学支出( $SCI$ ),采用科学支出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的比值衡量。政府科研投入通过技术溢出与产学研合作可能会影响企业创新,因此需要控制其对企业创新资源的影响。

#### (四)描述性统计

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企业突破性创新的最小值为0.0000,最大值为83.0000,标准差为11.1387,说明企业间的突破性创新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其均值为3.7050,说明中国企业的整体突破性创新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最小值为1.1853,最大值为23.7474,标准差为3.4327,说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地区间的市场协同发展有待进一步推进。其他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预期基本一致,本文不再赘述。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	样本量	中位数	标准差	最小值	均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INNOV$	37 004	0.000 0	11.138 7	0.000 0	3.705 0	83.000 0
解释变量	$MINTEG$	37 004	17.458 9	3.432 7	1.185 3	17.540 2	23.747 4
机制变量	$MD$	37 002	4.047 8	4.459 7	0.189 2	5.367 8	18.079 3
	$MKTE$	37 004	0.103 8	0.215 7	0.034 1	0.192 3	1.000 0
	$KSI$	37 004	0.250 3	0.186 9	0.016 3	0.274 0	0.789 3
	$FAR$	37 004	0.169 8	0.155 9	0.001 9	0.203 4	0.684 7
控制变量	$OHD$	37 004	12.229 4	66.176 1	1.456 5	32.329 4	473.179 4
	$CR$	37 004	1.734 8	2.819 8	0.330 2	2.660 2	18.179 8
	$ROA$	37 004	0.039 0	0.063 2	-0.259 1	0.037 7	0.196 0
	$EDU$	37 004	0.162 2	0.033 1	0.098 4	0.166 0	0.256 9
	$WAGE$	37 004	1.426 2	3.896 0	0.062 5	3.231 9	15.356 5
	$GDP$	37 004	10.745 5	11.673 4	0.595 1	13.990 0	44.653 0
	$SCI$	37 004	0.044 6	0.026 0	0.003 8	0.045 0	0.129 6

注:铜仁市缺少两年的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数据,因而市场需求规模变量的样本量减少为37 002。

##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基准回归

表2报告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突破性创新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仅控制年份固定效应与城市固定效应,列(2)仅控制年份固定效应与企业固定效应。结果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列(3)是同时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其中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回归系数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突破性创新具有驱动作用。就其经济意义而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标准差,企业突破性创新相对于其对数化处理后的标准差(1.0247)提高0.87%。由此,假设1得到验证。究其原因,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打破行政壁垒,优化制度环境,重构创新要素的底层配置逻辑,为企业突破性创新提供全新场景,驱动企业技术的突破性创新发展。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i>MINTEG</i>	0.004 0*** (2.689 2)	0.002 5* (1.848 5)	0.002 6** (1.961 8)
<i>FAR</i>	-0.085 5 (-0.931 4)	0.127 3** (2.075 6)	0.120 6* (1.896 2)
<i>OHD</i>	0.003 1*** (7.157 1)	0.001 0*** (3.348 4)	0.001 1*** (3.598 1)
<i>CR</i>	0.017 7*** (4.979 0)	-0.009 9*** (-3.609 5)	-0.010 5*** (-3.820 1)
<i>ROA</i>	0.896 2*** (6.367 5)	-0.200 4*** (-2.599 0)	-0.193 7** (-2.503 5)
<i>EDU</i>	0.841 9** (2.411 7)	0.743 4*** (2.577 4)	0.702 4** (2.221 9)
<i>lnWAGE</i>	0.010 8 (0.282 6)	-0.087 4*** (-3.110 6)	-0.054 0 (-1.617 3)
<i>lnGDP</i>	0.065 5 (0.932 5)	0.043 4 (1.123 5)	0.056 0 (0.811 9)
<i>SCI</i>	0.962 3* (1.959 8)	0.902 7** (1.999 4)	0.986 9** (2.117 4)
常数项	0.157 0 (1.017 2)	0.425 4*** (4.234 8)	0.384 9** (2.520 6)
企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7 004	37 004	37 004
$\bar{R}^2$	0.104 6	0.684 9	0.685 4

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t*值,后表同。

## (二) 内生性分析

考虑到可能存在企业突破性创新反向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情况,本文通过工具变量法以缓解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以期提高研究结论可信度。本文参考巴蒂克(Bartik)<sup>[33]</sup>的研究,构建移动份额工具变量,即以滞后一阶的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在时间上一阶差分的交互项作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工具变量(IV),然后进行回归,具体结果见表3。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工具变量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呈显著正相关。同时,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为 1 305.570, P 值为 0.000 0,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假设;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大于 Stock-Yogo 在 10%水平下的临界值 16.38,表明无弱工具变量问题。综上,本文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和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这表明,在缓解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突破性创新存在正向作用。由此,假设 1 再次得到验证。

表 3 内生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i>MINTEG</i>		0.004 1** (2.324 5)
<i>IV</i>	0.028 6*** (163.659 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Kleibergen-Paap rk LM	1 305.570 [0.000 0]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2.7×10 <sup>4</sup> [16.38]	
样本量	31 755	31 755
Centered R <sup>2</sup>	0.443 3	0.002 9

注:方括号内为 P 值,大括号内为 Stock-Yogo 在 10%水平下的临界值。构造工具变量过程中,样本量减少为 31 755。

企业进行突破性创新的代理变量(*INNOV2*),并进行前后 1%缩尾处理。由表 4 可知,更换被解释变量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

再次,依据卞成权等(Byun et al.)<sup>[36]</sup>的研究,采用五年内被引次数居前 1%的专利数量(剔除零被引)衡量突破性创新(*INNOV3*),同样进行前后 1%缩尾处理。由表 4 可知,更换被解释变量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回归系数在 5%水平下显著为正。

最后,从研发投入维度构建创新效率指标,即专利申请总量加 1 后取自然对数与研发支出加 1 后取自然对

## (三) 稳健性检验

###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为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参考龙睿等<sup>[34]</sup>的研究,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缓解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带来的影响。

首先,基于企业独立获得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科技含量,分别赋予其 0.5、0.3 和 0.2 的权重,加权计算得到企业专利授权量,作为企业突破性创新的代理变量(*INNOV1*),并进行前后 1%的缩尾处理。由表 4 可知,更换被解释变量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回归系数在 5%水平下显著为正。

其次,参考孙焱等<sup>[35]</sup>的研究,基于国际专利分类(IPC)号的前四位识别技术知识的新颖性:若企业在第 *t* 年申请的专利中包含其前五年(*t-5*年至 *t-1*年)未曾出现过的 IPC 前四位分类号,则视为突破性创新,并以该类专利年度累计数量作为企

数之比,并进行前后 1% 缩尾处理。为进一步区分创新类型,按该指标中位数将样本分为突破性创新(*InnoEff1*)、渐进性创新(*InnoEff2*)两组分别进行回归。由表 4 可知,更换被解释变量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突破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以上替换测度方式的检验结果均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企业突破性创新具有稳定的积极影响,缓解了测量误差带来的潜在偏误,从而支持了假设 1 的稳健性。

表 4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替换被解释变量

变量	<i>INNOV1</i>	<i>INNOV2</i>	<i>INNOV3</i>	<i>InnoEff1</i>	<i>InnoEff2</i>
<i>MINTEG</i>	0.002 6** (2.145 9)	0.046 6*** (13.754 1)	0.002 7** (2.548 0)	0.000 2* (1.960 1)	-0.000 1 (-0.283 2)
常数项	0.937 1*** (6.136 9)	0.140 9 (0.593 6)	0.243 4*** (2.605 6)	0.213 5*** (20.482 7)	0.094 6*** (6.706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7 004	22 836	24 253	15 474	15 492
$\bar{R}^2$	0.772 6		0.395 7	0.657 1	0.424 6

### 2. 排除重大事件的干扰

2019 年底新冠疫情暴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和企业发展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剔除 2020 年的样本数据,对模型(1)重新回归,以缓解疫情的随机冲击对本文结论的影响。由表 5 可知,排除重大事件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突破性创新影响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再次验证了假设 1 的稳健性。

### 3. 改变聚类层级

为缓解可能存在的组内相关性对统计推断的影响,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依次采用了更严格的聚类稳健标准误进行检验。首先,参考韩奕和吴明琴(Han & Wu)<sup>[8]</sup>的做法,将标准误依次聚类到行业层面以及行业-年份层面。由表 5 可知,改变聚类层级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回归系数仍在 5% 水平下显著为正。其次,考虑到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城市层面的变量,且样本期内可能存在普遍的年度共同冲击,使误差项同时存在同一城市-同一年份内不同企业间相关以及同一年份内不同城市间相关两种相关性。为此,最终将标准误聚类层级调整为城市-年份双向聚类。由表 5 可知,再次改变聚类层级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且方向和大小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以上检验结果表明,在考虑了不同层面的组内相关性后,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稳健,即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有效推动企业突破性创新。假设 1 进一步得到验证。

表 5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排除重大事项干扰与调整聚类

变量	排除重大事件干扰	聚类行业层面	聚类行业-年份层面	城市-年份双向聚类
<i>MINTEG</i>	0.002 7** (2.005 8)	0.002 6** (2.018 2)	0.002 6** (2.037 1)	0.002 6* (1.848 0)

表5(续)

变量	排除重大事件干扰	聚类行业层面	聚类行业-年份层面	城市-年份双向聚类
常数项	0.378 8** (2.496 2)	0.384 9* (1.898 6)	0.384 9*** (3.871 7)	0.384 9*** (3.647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3 360	37 004	37 004	37 004
$\overline{R^2}$	0.683 1	0.686 3	0.686 3	0.686 3

#### 4. DK 稳健误差检验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能存在空间外溢特征,其政策效应可能通过产业链、要素流动等途径在区域间传导,导致模型误差项存在复杂的截面相依性与时间自相关性。为此,本文进一步采用 DK 稳健误差进行估计。表 6 报告了基于 DK 稳健误差的估计结果。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潜在的空间与时间相关性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回归系数虽为正,但未能在常规统计水平下显著。这一结果提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平均效应可能被企业间的异质性所掩盖,即政策影响在不同类型企业间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为此,本文依据资源基础观与规模经济理论,推测大规模企业更有能力利用统一市场带来的机遇。进一步地,本文将样本按企业规模中位数划分为大规模组与小规模组进行检验。分组结果验证了这一理论预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大规模企业的突破性创新产生了更明显的促进作用。以上结果从异质性视角证实了核心结论的稳健性与边界条件,再一次验证了假设 1。

表 6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DK 稳健误差

变量	全样本 DK 稳健误差	大规模企业组 DK 稳健误差	小规模企业组 DK 稳健误差
<i>MINTEG</i>	0.002 6 (1.685 0)	0.004 1** (2.449 5)	0.002 6 (1.413 9)
常数项	-0.016 2 (-0.131 0)	0.540 4*** (4.322 4)	-0.359 4* (-1.933 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7 004	18 502	18 502
$\overline{R^2}$	0.049 5	0.051 3	0.049 7

#### 5. 安慰剂检验

为排除不可观测特征、随机因素等的干扰,本文在样本中随机虚构政策处理组和时间节点,重复基准回归模型 500 次。结果如图 1 所示,模拟回归的估计系数集中分布于零值附近,且服从正态分布,而全国统一

大市场的基准回归系数则位于该经验分布的极端尾部。因此,安慰剂检验结果符合预期,即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驱动效应并非由偶然因素驱动,从而有力地支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 (四) 机制检验

##### 1. 市场需求规模扩大检验

理论分析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形成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扩大市场需求,可以分摊研发成本,进而驱动企业突破性创新。由表 7 第一列回归结果可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可以促进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大。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作为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可以破除区域壁垒,有效增加市场需求,这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并提高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以及以市场培育为导向的创新环境<sup>[37]</sup>,进而驱动企业突破性创新。由此,假设 2 得到验证。

##### 2. 竞争环境优化检验

理论分析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平、透明和高效的竞争环境,激发企业创新活力,进而驱动企业突破性创新。由表 7 第二列回归结果可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促进地区的公平竞争,优化地区竞争环境。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统一的市场规则和竞争准入体系提高了地区的公平竞争水平,使企业所在的市场竞争环境得到优化,降低了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了资源浪费,促使企业能够将更多的资源向突破性创新倾斜<sup>[6]</sup>,进而驱动企业进行突破性创新。由此,假设 3 得到验证。

##### 3. 分工程度深化检验

理论分析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打破要素流动壁垒,推动生产要素在产业间自由流动,促使分工形态从传统的地区专业化向高级的价值链协同化演进,激发异质性知识的交叉碰撞,进而驱动企业突破性创新。由表 7 第三列回归结果可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提升地区产业多样化水平,深化分工程度<sup>[38]</sup>。以产业价值链协同为导向的分工深化,可以促进知识的交流和扩散,提高区域创新能力,产生雅各布(Jacobs)外部性,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sup>[39]</sup>,推动企业突破性创新。由此,假设 4 得到验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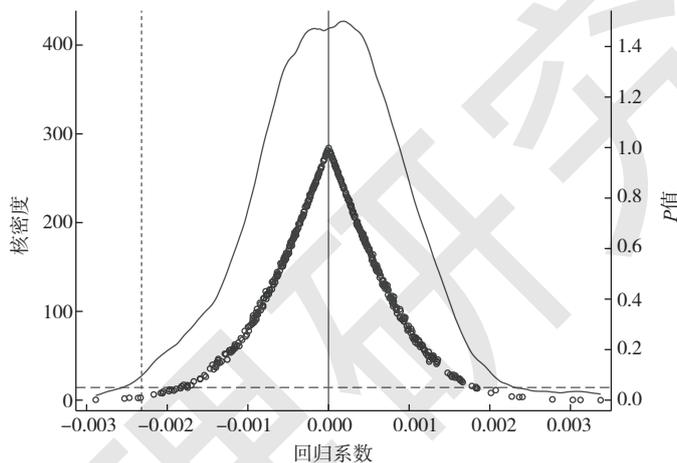


图 1 安慰剂检验结果

表 7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lnMD	MKTE	KSI
<i>MINTEG</i>	0.001 6*** (8.572 3)	-0.000 3*** (-3.218 1)	-0.003 7*** (-19.257 7)
常数项	-0.856 9*** (-20.616 7)	0.261 7*** (13.186 7)	0.468 7*** (15.626 4)

表7(续)

变量	lnMD	MKTE	KSI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7 001	37 004	37 004
$\overline{R^2}$	0.991 1	0.942 2	0.736 4

注:第1列样本量为37 001的原因在于回归时自动剔除1个单例观测值。

### (五) 异质性分析

#### 1. 企业层面异质性

不同规模的企业在资源禀赋、组织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这可能对企业突破性创新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按照企业总资产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大规模企业组和小规模企业组,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行分组回归。由表8可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促进大规模企业的突破性创新。

究其原因,基于资源基础观与互补资产理论,与小规模企业相比,大规模企业所积累的品牌、供应链管理 etc 互补性资产,可与突破性技术形成协同,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降低了这些资产的跨区域整合成本。同时,大规模企业在创新网络中居于核心节点,更善于吸收和重组全域流动的知识要素,实现“远距知识重组”。此外,大规模企业的组织架构也赋予其更优的制度响应能力,能快速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度红利转化为创新策略。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大规模企业更能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带来的要素连通性转化为突破性创新的现实优势。

融资约束的缓解可以促进企业投资,使企业获得更多资金支持,因此可能对企业突破性创新产生差异性影响。本文以SA指数来度量企业的外源融资约束,该指数绝对值越大,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越高。本文按照SA指数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融资约束组与低融资约束组,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行分组回归。由表8可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促进低融资约束企业的突破性创新。

表8 企业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企业规模		融资约束	
	小	大	高	低
<i>MINTEG</i>	0.002 6 (1.424 9)	0.004 1** (2.125 8)	0.001 0 (0.556 7)	0.004 8** (2.260 5)
常数项	0.001 9 (0.010 4)	0.835 8*** (3.571 3)	0.114 5 (0.648 0)	0.773 8*** (2.763 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表8(续)

变量	企业规模		融资约束	
	小	大	高	低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8 299	18 289	18 286	18 301
$\overline{R^2}$	0.588 0	0.770 2	0.582 8	0.738 4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低融资约束企业的突破性创新效应更明显,其根本原因可能在于该政策环境进一步放大了不同规模企业之间资源禀赋与风险应对能力的结构性差异。首先,依据融资优序理论与信息不对称理论,低融资约束企业通常具备更透明的信息环境与更健全的信用记录,在金融市场中享有较低的信息溢价与代理成本。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促进资本、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高效互联,进一步优化了这类企业的外部融资条件,使其能够为高风险、长周期的突破性创新持续募集资金,从而有效缓解创新活动面临的融资约束。相比之下,高融资约束企业自身存在的信息透明度较低、抵押不足等问题,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环境中并未得到根本改善,金融市场基于风险定价的本质使其依然面临较高的融资门槛与成本,难以获得支撑突破性创新所需的长期、稳定资金,因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其创新的“松绑”效应微弱。

其次,基于资源基础观与动态能力视角,低融资约束不仅反映企业资金充裕,更意味着其拥有较强的财务柔性 with 风险抵御能力。突破性创新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全国统一大市场在拓展机遇的同时也加剧了市场竞争。低融资约束企业可凭借其财务韧性,持续投入研发、承担试错成本,并在市场结构变动中主动布局前瞻性创新,而非被动采取短期适应策略。然而,高融资约束的企业相对缺乏这种财务缓冲。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这类企业的首要战略目标是确保正常运行与现金流安全,会将有限的资源优先配置于风险较低、回报更快的模仿或渐进式创新。

最后,从创新投资的信号传递机制来看,低融资约束企业能够通过持续稳定的研发投入,向市场传递其技术实力与发展承诺的积极信号,从而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的开放生态中,吸引优质合作伙伴与高端人才,持续巩固其在突破性创新中的竞争优势。相反,高融资约束企业受制于资源匮乏,其研发投入往往规模小、间断性强,难以向市场传递出可信赖的强势创新信号。因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并非均等地惠及所有企业,它通过强化金融市场效能与市场竞争,使低融资约束企业所固有的信息、资源与风险承担优势更为凸显,从而为其突破性创新提供了关键的制度性助力。

## 2. 行业层面异质性

不同行业的要素密集度可能会对企业的创新决策和创新绩效产生差异性影响,进而引起企业突破性创新异质性。本文参考周睿等<sup>[40]</sup>的研究,将样本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与技术密集型行业三组,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行分组回归。由表9可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推动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突破性创新。

究其原因,从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理论来看,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打破了区域市场分割的壁垒,通过拓宽市场空间、打通资本跨区域流动的通道,增强了资本密集型行业发展所依赖的规模效应。在此基础上,行业内企业可以更高效地集聚并优化配置大规模资本,为突破性创新所必需的高投入、长周期研发活动,搭建起稳定且可持续的资源保障体系。基于产业链与价值链理论,资本密集型行业本身具备较高的技术壁垒与较强的产业链整合能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在破除区域壁垒的过程中,不仅加剧了行业内的市场化竞争,也

催生了协同互补的新型合作环境。这种双重作用驱动资本密集型企业主动凭借自身的资本优势与技术积淀,整合上下游创新资源,开展突破性技术研发。

相比之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创新模式以劳动力规模扩张与生产流程优化为核心,创新活动多集中于渐进式技术改良,其资源条件与风险承受能力不足,难以支撑突破性创新所需的长期资本投入与高风险。技术密集型行业虽以研发创新为核心竞争力,但其创新活动往往受限于特定技术轨道与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体系,存在技术转换成本偏高、路径依赖特征较强等问题。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的竞争格局下,这类行业在短期内较难实现快速调整既有技术布局和突破性的技术跃迁。

### 3. 地区层面异质性

地区政策实施会对本地企业突破性创新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根据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设置政策虚拟变量 (*POLICY*)。若企业所在城市在某年被确定为创新试点城市则设定该政策虚拟变量为 1, 否则为 0, 然后根据该政策虚拟变量进行分组, 在模型(1)的基础上进行回归。由表 9 可知,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促进位于创新试点城市的企业提升突破性创新水平。

究其原因, 首先, 创新试点城市作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先行试验区, 核心优势在于拥有制度创新的试错空间和跨部门协调的便利。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了区域行政壁垒, 使制度优势进一步激活, 即试点城市的先行先试可以转化为跨区域合作的制度协调优势, 降低企业跨区域研发协作、要素流动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在接入全国性市场网络时, 既能依靠规模效应摊薄高风险研发的固定成本, 又能借助地方制度红利提高创新投入的边际收益。非试点城市则因缺乏制度创新基础, 即便市场壁垒破除仍只能被动跟进。

其次,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打破要素流动的区域限制, 增强了试点城市作为区域创新枢纽的资源虹吸与辐射能力: 一方面, 试点城市的创新要素能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 缓解本地要素闲置与外部需求错配的问题; 另一方面, 外部优质要素也能自由流入试点城市, 与本地企业形成互补。这不仅能以更低成本获取创新所需的异质性资源, 更能通过频繁的跨界互动与知识溢出, 打破既有技术路径的锁定, 催生出具有颠覆性的技术创新方向。非试点城市则可能面临“要素外流+路径依赖”的困境。例如, 部分高端人才、核心技术等稀缺要素向试点城市单向流动, 自身创新资源禀赋弱化; 同时, 由于缺乏高频跨界互动与知识溢出场景, 企业多陷入传统技术轨道, 难以实现创新范式突破。

最后, 创新试点城市的区位标签本身就是企业向市场传递的创新能力认证信号。对风险投资机构而言, 试点城市的企业意味着更完善的创新支持体系和更低的政策不确定性, 从而减少了投资决策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来说, 与试点城市企业合作, 意味着更稳定的技术研发能力和更广阔的市场前景, 更容易形成长期稳定的创新协作联盟。这种信号效应可以帮助试点城市的企业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快速建立起创新领域的声誉优势, 持续吸引各类优质资源向创新活动集聚, 进而巩固其在突破性创新中的先发优势。

表 9 行业与地区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行业类型			城市类型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非创新试点城市	创新试点城市
<i>MINTEG</i>	0.001 8	0.006 7**	0.001 0	0.003 1	0.002 5*
	(0.953 6)	(2.506 1)	(0.466 3)	(0.707 1)	(1.820 8)

表9(续)

变量	行业类型			城市类型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非创新试点城市	创新试点城市
常数项	0.012 5 (0.060 6)	0.690 7*** (2.987 6)	0.100 2 (0.346 2)	0.273 4 (1.288 1)	0.200 0 (0.921 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9 196	10 057	17 686	6 993	29 685
$\bar{R}^2$	0.611 7	0.634 7	0.677 6	0.643 0	0.702 4

##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分析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基于2010—2022年城市-企业层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水平可以有效推动企业突破性创新,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主要通过扩大市场需求规模、优化竞争环境以及促进分工深化驱动企业突破性创新。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积极影响主要集中在大规模、低融资约束的企业;与分属于劳动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相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突破性创新驱动效果更好;此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更好地驱动位于创新试点城市的企业突破性创新。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助力企业突破性创新。鉴于地方保护与要素流通梗阻是企业突破性创新的重要壁垒,应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为突破口,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向纵深发展,通过破除行政性市场分割、推进技术标准统一、完善物流网络体系建设等方式打破创新壁垒。同时,在畅通市场运行机制的基础上,要强化要素高效配置,通过打通产学研转化通道、优化科技金融生态链、加快建设数据要素流通网络等措施,构建“人才-技术-资本-数据”驱动的创新要素配置体系,系统性降低跨区域创新成本。此外,鉴于制度环境的持续优化是激励企业进行突破性创新的根本保障,应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优化创新税收政策、完善政府采购政策体系。例如,完善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形成覆盖确权、维权、维权的全链条保护机制;实施“负面清单+阶梯式加计扣除”的精准税收政策,强化对突破性创新的靶向支持;优先将重大创新产品纳入政府采购目录,以市场需求引导技术突破。

第二,实施“三位一体”系统性改革,激活企业突破性创新内生动力。应从需求、竞争和分工三方面抓起,化解企业突破性创新难题。其一,以需求升级牵引创新动力,拓展高价值市场空间。积极培育新消费市场和加强高端装备应用推广,通过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企业的前沿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提供确定性预期和商业化空间。其二,以竞争政策倒逼创新压力,构筑优胜劣汰的健康生态。加快完成反垄断法实施

细则的修订,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进一步加强对隐性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的监管,提高执法效率,为企业营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对行业内企业形成持续的创新压力。其三,以分工深化赋能创新能力,重塑高效协同的产业体系。着力提升产业体系的多样化与协同性,鼓励传统产业集群有规划地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服务业等异质性产业主体,通过丰富区域产业谱系,催生更多元、更精细的专业化分工,进一步拓展企业突破性创新的知识来源与技术路径,赋能企业非连续性的创新能力跃升。

第三,制定分类分层支持政策,放大异质性创新红利。构建精准分层的支持体系,使政策扶持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在企业层面,既要支持大规模企业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要素连通性深化跨区域创新网络构建、带动中小企业协同创新,也要以专精特新培育计划为核心,通过梯度研发补贴、专项风险补偿基金等工具破解中小企业资源短板与创新风险难题,同时针对高融资约束企业痛点,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信息流动优势建立创新信用评价体系,推出专项再贷款、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即报即退”等政策,引导资本分担其创新试错成本。针对不同行业,对资本密集型行业需畅通跨区域资本流动通道、完善产业链协同机制以强化规模效应,对技术密集型行业要加大共性技术平台建设、建立成果转化激励机制以打破技术路径锁定,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则以人力资本升级为核心,通过技能培训、小额创新贷款等方式打造“技术+资本+创新”三位一体的支撑体系。在区域层面,需深化创新试点城市制度创新优势,推动其专项政策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衔接,强化创新生态枢纽功能与要素虹吸辐射能力,建立试点与非试点城市要素共享机制,同时放大试点城市创新能力认证信号价值,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国际创新交流活动等吸引优质资源,形成“试点突破-全域扩散”的改革合力,破解创新不均衡问题,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要素连通性转化为突破性创新动能。

#### 参考文献:

- [1]徐照宜,巩冰,陈彦名,等. 金融科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突破性创新——基于全球专利引用复杂网络的分析[J]. 金融研究,2023(10):47-65.
- [2]詹新宇,梁蓝心. 链长制如何“链”出企业技术创新[J]. 中国工业经济,2024(11):137-155.
- [3]QIN T, QIN C, WANG J X, et al. Can the digital economy enhance enterprises'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025, 104: 104269.
- [4]周冬华,彭剑飞,胥文帅. 产品保险助推企业跨区域发展——基于异地子公司新设和撤并的证据[J]. 经济学(季刊),2025,25(2):410-427.
- [5]陈喆,郑江淮,冉征.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地区间技术互补与省际贸易增长[J]. 管理世界,2025,41(3):68-95.
- [6]张记国,卢黎歌.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价值取向、逻辑理路与实现策略[J]. 南开经济研究,2024(12):50-66.
- [7]孙伟增,张柳钦,万广华,等. 政务服务一体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兼论政府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作用[J]. 管理世界,2024,40(7):46-68.
- [8]HAN Y, WU M Q. Inter-regional barriers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4, 167: 103197.
- [9]丁涛,盛燕,谭睿鹏,等. 全国统一大市场与经济增长——来自安徽省加入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证据[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41(12):25-46.
- [10]张洪胜,谢月星,杨高举,等.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福利效应研究[J]. 管理世界,2025,41(1):15-40.
- [11]朱文涛,顾乃华,余壮雄,等. 市场一体化何以驱动城市创新——远亲不如近邻的350公里[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7(12):145-165.
- [12]林晨,李宇潇. 全国统一大市场与地方产业政策竞争[J]. 经济研究,2024,59(12):40-57.

- [13] 钱学锋,周文倩. 国内国际双循环对冲“友岸外包”经济成本的效应评估[J]. 管理世界,2024,40(7):61-84.
- [14] LI X L, SI D K. Does financial market liberalization promote corporate radical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024, 95: 103500.
- [15] 刘政,余龙,匡慧殊. 制度型开放如何影响企业技术创新? ——来自跨境电商综试区的证据[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5,27(5):36-51.
- [16] 黎文靖,郑曼妮. 实质性创新还是策略性创新? ——宏观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的影响[J]. 经济研究,2016,51(4):60-73.
- [17] 李玉花,林雨昕,李丹丹. 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如何影响企业创新[J]. 中国工业经济,2024(10):155-173.
- [18] ZHONG C B, HUANG R, DUAN Y L, et al. Exploring the impacts of knowledge recombination on firms'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dynamism[J]. *Journal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2024, 28(3): 698-723.
- [19] HOU J H, YANG X C, SONG H Y. The impact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 utilization on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in enterpris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strategic aggressiveness[J]. *Systems*, 2024, 12(7): 248.
- [20] MA Y H, ZHU E J. Supply chain finance and enterprise dual innovation: the perspective of breakthrough and incremental innovation[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025, 105: 104415.
- [21] WAN M F, LI L. Impact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on construct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evidence from inter-regional capital flows[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025, 104: 104331.
- [22] 唐晓彬,何桂焯,洪俊杰. 大中城市政府采购与统一大市场建设——基于二元边际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2025(9):23-41.
- [23] 黄蔚,张协奎.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否赋能城市创新合作? [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5,46(8):95-112.
- [24] 陈志远,于皓,张杰. 中国知识溢出本地化的行政边界效应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25(1):81-99.
- [25] 徐保昌,刘益宁,李思慧. 市场整合与企业 ESG 表现[J]. 经济问题,2024(7):94-104.
- [26] 张陈宇,孙浦阳,谢娟娟. 生产链位置是否影响创新模式选择——基于微观角度的理论与实证[J]. 管理世界,2020,36(1):45-59.
- [27] 陈林,陈臻,张玺文,等. 产业链融入与企业创新——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产业链测度新方法[J]. 经济研究,2024,59(10):56-74.
- [28] DONG X, YU M Z. Does FinTech development facilitate firms'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 2023, 89: 102805.
- [29] 吴超鹏,严泽浩. 政府基金引导与企业核心技术突破:机制与效应[J]. 经济研究,2023,58(6):137-154.
- [30] 徐保昌,李佳慧,李秀婷. 市场整合与出口增长——来自长三角地区的经验证据[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3(3):116-133.
- [31] 毛其淋,盛斌. 对外经济开放、区域市场整合与全要素生产率[J]. 经济学(季刊),2012,11(1):181-210.
- [32] 牛志伟,许晨曦,武琪. 营商环境优化、人力资本效应与企业劳动生产率[J]. 管理世界,2023,39(2):83-100.
- [33] BARTIK T J. How do the effects of local growth on employment rates vary with initial labor market conditions[Z]. *Upjoh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 09-148*, 2009.
- [34] 龙睿,余典范,王超. 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供应链透明度[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25,46(7):22-42.
- [35] 孙焱,张艳丽,刘金桥. 免责激励对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效应[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5,42(11):51-63.
- [36] BYUNS K, OH J M, XIA H. Incremental vs.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the role of technology spillovers[J]. *Management Science*, 2021, 67(3): 1779-1802.
- [37] 王宏起,张琳峰,杨仲基. 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性创新实现机理研究——基于制度逻辑与创新生态系统的三维共演[J/OL]. 科研管理, 2025[2025-10-01]. <https://link.cnki.net/urlid/11.1567.g3.20250425.1736.004>.
- [38] 刘志彪,孔令池. 全面推动市场由大到强转变: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历史过程[J]. 经济学家,2025(9):5-15.
- [39] 陈露,刘修岩. 产业空间共聚、知识溢出与创新绩效——兼议区域产业多样化集群建设路径[J]. 经济研究,2024,59(4):78-95.
- [40] 周睿,华笑焯,戴翔. 制度型开放赋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5(2):88-109.

## How does the Building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Drive Firms'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XU Baochang<sup>1</sup>, DING Zhongxian<sup>1</sup>, LI Sihui<sup>2</sup>

(1.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266061;

2. Jiangsu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210004)

**Abstract:**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constitutes the pivotal force propelling sustained corporate growth and enhancing core competitiveness. The building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as an institution-oriented strategic initiative, provides essential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facilitating such innovation and strengthening corporate core competitivenes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on firms'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using matched data from prefecture-level and above cities and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2.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building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stimulates firms'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across various tests. Mechanism analyses reveal that the building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drives innovation upgrading through expanding market demand, optimizing competitive environments, and deepening the division of labor. Heterogeneity analysis furth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larger firms, those facing lower financing constraints, capital-intensive firms, and firms located in innovation pilot cities.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threefold. First, it enriches the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beyond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by exploring its impact on firms'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illustrating how reduced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institutional transaction costs enhance firms' innovation incentives. Second, it deepen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regarding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corporate behavior by examining how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shapes firms'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The analysis proceeds through three pathways: market demand expansion,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optimization, and deepening division of labor, and from three lenses: stimulating innovation motivation, imposing innovation pressure, and enhancing innovation capability. Third, it provides micro-level evidence and offer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implementing an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aimed at stimulating firms'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In conclus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s the effect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rising from the building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through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enses and uncovers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underlying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robust empirical evide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micro-level impacts of the building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on firms' innovation and offers a decision-making bas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further optimize market environment design and implement targeted innovation incentive policie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advancing market integ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opening up can enhance the momentum for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among firms, offering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fostering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and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Keywords:**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factor allocation; market demand;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division of labor

编校: 蒋 琰